

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以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为分析视角

赵长峰 左祥云

【摘要】 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时代主题观、战略与策略的基本问题,以及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等内容。这一思想不仅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体系的形成,既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结合,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外交智慧与实践经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借鉴党的统一战线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适应时代变化的外交战略策略,并在新时代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策略框架。该框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基本原理,发展出以时代方位、战略目标、伙伴关系、合作平台和道义感召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开创性成就提供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解释工具,也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

【中图分类号】 D820;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25)01-0139-09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合作模式研究”(21BGJ002);2024年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战略选择”(CCNU24ZZ167)。

【作者简介】 赵长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左祥云,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与马克思的哲学学说、经济学说及社会主义学说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四个组成部分^①,凸显了战略策略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强调,政策和策略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线^②,并将战略策略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之一。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日益增强,国内外学者纷纷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之道。然而,现有研究多从西方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或从具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出发,较少有从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视角进行的研究。而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何采取特定战略策略并取得成功的根源。正如习近平指出:“正确运用战略和策略,是我们党创造辉煌历史、成就千秋伟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秘诀。”^③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95页。

② 参见《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页。

③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载于《求是》2023年第19期。

一、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从根本上讲，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战略策略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这一理论的有力工具，是其从理论到现实的中介^②。马克思始终重视战略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指导作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重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③。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历经经典作家的理论总结和百余年的革命实践发展，形成了时代主题观、战略策略的基本问题及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等主要内容。

（一）时代主题观

时代主题观是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观察、分析和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起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前提和依据，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整体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列宁指出：“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④时代主题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中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反映了对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准确把握与判断。因此，只有科学、正确地把握时代主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进而辩证地、准确地认识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实事求是地制定国家发展的各项战略和策略以解决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时代主题观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二）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

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核心在于如何处理远大目标与当前斗争之间的关系^⑤。战略问题是对国家远景目标的全局性、时代性判断，涉及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目标。相较之下，策略则通常是应对当前紧迫的、复杂的斗争而提出的具体措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近期目标和利益而斗争，同时也代表着运动的未来^⑥。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在为远大目标奋斗时，必须高度重视当前斗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参与当前斗争时，不能忽视远大目标。然而，由于远大目标和长远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将这些目标和利益分解成一系列短期目标和阶段性成果来实现。若当前的斗争无法克服，远大目标的实现只能沦为空谈。反之，若放弃远大目标，当前斗争就可能迷失方向，或者因一时的挫折而一蹶不振。因此，在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时，必须处理好远大目标与当前斗争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当前斗争是实现长远目标的一部分，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主要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与总政策，是制定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

（三）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形成了一系列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1. 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

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源于长远利益与当前斗争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中的统一战线包括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在革命的各个阶段，新生的革命力量往往面临保守落后势力的顽强抵制。为此，革命力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建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以壮大自身，孤立反革命势力，从而实现革命的胜利。列宁指出，革命策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尽可能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② 参见孙显元：《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研究战略和策略问题》，载于《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5期。

③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⑤ 参见冯峰：《略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原理》，载于《学术界》1991年第2期。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保证无产阶级拥有广泛的、哪怕是暂时的同盟^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将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②

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列宁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战略与策略不仅考虑到民族特点，还承认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任务，并不局限于“自己”祖国的利益，而是将本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视为国际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当这种战略具有国际主义性质时，它才可能是科学的、战无不胜的战略^③。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一方面表明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根本基础，另一方面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策略时，必须将本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本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实质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战略策略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在制定和实施战略策略的组织路线上，不应仅局限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组织建设，而应关注国际上哪些国家、国际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天然同盟军，哪些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哪些是需要采取合作共赢策略的对象，以及哪些是需要孤立和斗争的对象。甚至在具体的国际议题上，也可以与斗争对象建立议题性的国际统一战线，以达到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工作路线上，不应仅局限于无产阶级国家内部的群众路线，而应聚焦于“真正的多边主义”，即国际事务由各国共同商量，世界的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2. 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习近平指出，“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④。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是由战略与策略的基本问题所决定的。战略是指引国家长远发展和全局方向的长期规划，一旦确定，就需长期坚持，不可随意更改。然而，战略的实施过程并非一成不变，环境条件不断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策略具有灵活性，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以应对不同阶段、领域、层次和地区的具体挑战。策略的灵活性必须服务于战略目标，不能脱离战略方向和性质。例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产阶级政党总结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⑤以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⑥等原则。前者强调从长远历史发展来看，反动势力终将灭亡，人民的力量必然胜利，但在具体斗争中需认真对待敌人，采取灵活有效的策略。后者则要求在对敌斗争中，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敌人，这些原则进一步体现了战略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生成逻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强烈的现实逻辑。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策略思想，并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党成功地将革命战略策略思想应用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独立与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逻辑基础。

①③ 参见[苏]彼·尼·巴特里凯也夫：《列宁主义政治战略与策略》，北京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3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⑤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生成的历史逻辑

1. 从党的统一战线经验中借鉴探索新中国外交战略策略（1949年—1978年）

新中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发展，深受党的统一战线经验的影响。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也提到，“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围堵，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中苏关系恶化后，为抵御苏联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撇开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联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明确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进一步确立了团结第二世界，联合第三世界，构建独立自主的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这一时期，世界总体上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新中国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安全。虽然因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交策略经历了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的灵活转变，但战略的坚定性始终如一，国际统一战线原则也贯穿始终。

2.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中自主调整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策略（1979年—2012年）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国家的对外战略策略也必须随之调整。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②。这一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促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国际关系格局，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暂时挫折，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实施制裁。面对这一严峻局面，邓小平依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提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③。基于此，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转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使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保持了稳定，并成功应对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抓住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为此，邓小平将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调整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苏东剧变等重大国际事件的冲击下，中国依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只是将外交策略调整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调整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外交战略策略以借鉴党在革命战争时代的斗争经验为起点，在与美国、苏联的斗争和确立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中逐渐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从一开始就有着极强的大国外交特征，善于从全球战略的视角进行外交战略策略的选择与调整，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生成的现实逻辑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外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复杂交织的国际国内形势，面临着“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等一系列现实课题。如何有效回答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形成的强烈现实逻辑，推动党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际相结合。通过这一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了符合党情、国情、世情的科学回应，开创了外交的新局面。

1. 中国之问：新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愈发严峻。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霸权的“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为维持传统霸权和优势地位，西方国家对华遏制和围堵力度不断加大。此外，俄乌冲突、以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356页。

哈冲突持续蔓延,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全球治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愈加突出,如全球气候危机、重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无论从国家实力、时代责任,还是从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来看,中国已无法再回到“韬光养晦”的外交路径,更不可能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然而,推行“国强必霸”的外交策略既不符合中华文明的传统,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进行外交?这成为中国外交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即“中国之问”。

2. 时代之问:推动构建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充满期待又感到困惑。一方面,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时代的潮流,全球各国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少数霸权国家仍停留在殖民扩张和冷战对抗的旧时代思维。为了维护自身霸权,不惜制造阵营对抗,挑起矛盾冲突。人类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是选择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也关乎人类的未来命运^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建设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时代之问”。世界期待中国外交对此给出“中国方案”。

3. 人民之问:中国梦怎样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相通,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如何相互成就?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通过英勇顽强的奋斗,终于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然而,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却充满敌视,极力遏制中国。他们污蔑中国“国强必霸”,抹黑“一带一路”是制造“债务陷阱”“主权剥夺”,造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并在中国周边挑唆矛盾、制造对抗。面对这些恶意中伤,中国外交必须妥善回答“人民之问”:中华民族追求幸福、和平、发展的中国梦如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的发展和富裕又如何惠及全球?中国外交肩负着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梦绝非“霸权梦”。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为全球发展创造机遇。中国不仅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致力于让其他国家和人民过得好,展示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相互成就的伟大责任。

4. 世界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是什么?怎样建设各个国家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②。然而,现代化的路径并无固定模式。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掌握了现代化的先发话语权,导致“西方化”几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往往不得不削足适履,强行适应“西方式”现代化的标准,但成效寥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各国探寻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提供了新选择。尤其是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中国走和平道路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它能为世界其他后发国家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路径和启示?向全球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不仅是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期待,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责任和任务。

这“四个之问”不仅关乎中国外交路径与方式方法的选择,更关乎世界和平的构建和人类文明道路的选择。这些问题源于人民共同富裕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国之大者”的博大胸襟,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结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制定战略策略的直接依据和现实动力。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内涵

(一) 外交战略策略

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以系统的、整体的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外交战略策略也是一个联系密切的复杂结构整体。外交战略策略是指主权国家等外交行为体在明确其外交愿景、使命和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国家利益以及自身实力和能力的综合考量,所制定出一套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全局性和灵活性的外交总体规划、行动方案和计谋。从构成上看,外交战略策略包括外交战略和外交策略两部分,整体上反映的是国

^① 参见《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页。

^② 《习近平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04月22日。

家长远发展利益和当前斗争的互动关系。外交战略是指一国在某一时间段之内,以发展本国长期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外交方针、路线、方略、总目标等,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关系到本国生存发展的具体领域战略,也包括全局的、整体的战略,中国共产党更倾向于制定全局的、整体的战略,如“三个世界”的外交战略,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总目标等,这里面就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在内。外交策略则是指主权国家为了实施自己的外交战略,在考量当前斗争局势发展变化的前提下,在外交活动中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方案,可以是一时一事一地一策略。从历史经验来看,战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和公开性的特点,战略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更改,要长期坚持。国家战略一般都是通过公开的文件进行发布,如美国每届政府都会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每五年的发展规划等。外交策略要接受外交战略的指导,为外交战略服务,但是外交策略又具有自身的阶段性、灵活性、问题领域性、机密性等特征。根据具体问题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并且一般不予对外公布,以保证策略的突然性和有效性。外交战略与外交策略的紧密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只有战略没有策略,战略就是空想,只有策略没有战略,策略就是无头苍蝇,最终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都要受到损害。

(二)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紧紧把握战略策略的辩证关系,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在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核心原则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1. 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社会主义新时代相互交织的时代方位

科学判断中国和世界所处的时代方位,是制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以大历史观为指导,从世界力量对比的横坐标和中华民族发展的纵坐标中,作出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这个新的时代方位判断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策略制定提供了根本依据。在这一指导下,中国明确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责任,提出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独特路径。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等倡议,回应了“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既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塑造力,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2. 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相统一的战略目标

战略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战略目标决定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方向。习近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规划了中国中长期的外交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其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打破西方国家主导的“国强必霸”逻辑和“修昔底德陷阱”;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基础,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而新型国际关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3. 积极发展结伴而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

建立同盟或统一战线来增强实现战略目标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为了吸引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国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愿意与任何国家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构建包容性的“朋友圈”。中国积极推进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国际大国关系。通过“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即使在面对美西方国家对华遏制和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也寻求在某些议题上与之建立议题联盟,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截至2022年9月,我国已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朋友圈”不断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覆盖全球^①。

^① 参见《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出席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209/t20220929_10774482.shtml.)

4. 搭建多元对话与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

搭建多元对话与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是将各参与方团结到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内的关键策略措施,是巩固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立利益共同体以达成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全球各国之所以愿意参与中国的战略目标,愿意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原因在于中国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帮助促进了他们的发展,真正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平等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导或参与搭建、扩容了多个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平台。如“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截至2023年10月,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亚投行,截至2024年4月,已有109个成员,包括95个正式成员和14个意向成员^②,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机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和职业教育等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此外,中国还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的扩容。这些合作平台不仅是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也是应对美西方围堵遏制、脱钩断链的重要法宝。

5. 坚持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增强国际道义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认为,战略策略必须具有国际主义性质才是战无不胜的,而国际主义是国际道德权威的重要来源。塑造国家在国际上的道德权威,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道义感召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影响力的关键表现,也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前提^③。2023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和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了一系列塑造中国国际道义感召力的战略策略。例如,提出并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立场处理国际热点问题,积极斡旋沙特与伊朗和解、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等,特别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与实践,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具有全人类共同道德价值的中国方案,使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⑤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能够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国际塑造力的负责任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与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中国特色大国战略策略展现了其伟大的时代价值。

(一) 巩固和加强了党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要建立一个“先锋队”,即由具有高度组织性和革命意识的成员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将引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⑦。事实上,中国外交也遵循了这一策略原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互交织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和执行克服当前斗争的策略,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这不仅是由中国共产党的

① 参见《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32679_32745/202310/t20231010_773751.html。)

② 参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yzjcsstzyh_700178/gk_700180/。)

③ 参考姜林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彰显负责任大国道义感召力》,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5/t20240527_5754945.shtml。)

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

⑤ 参考《外媒述评:中国“和平缔造者”角色实至名归》,参考消息网(<http://edu.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7fab30d4fc244152943050ec8c0b9f66/1/2024-07-26%2011:42?childrenAlias=undefined>。)

⑥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载于《求是》2022年第13期。

⑦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458页。

领导核心地位所决定,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成就所证明。2023年12月,党的第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就,其中明确指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①。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健全了党中央统领的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制定出台了《对外关系法》《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从全局战略高度把握国际形势,确定外交方向,谋划大局,制定政策,并对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实践操作和策略运用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长期执政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协同格局的组织建设,极大地保障了外交战略策略的连续性、稳定性、高效执行力和成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因为战略策略的成功高效实施而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 突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外交的价值底色”^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彰显了外交为民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把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外交工作的重要标尺。中国坚定维护海外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如2012年12月的中非撤侨、2015年的也门撤侨、尼泊尔地震撤侨、2016年的新西兰地震撤侨等行动。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党和政府千方百计保障海外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生活需求,向留学生、侨胞等群体发放“健康包”“春节包”,并开展“春苗行动”等。中国外交不仅植根于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同时也致力于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以共同发展为基础,致力于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因而被广泛赞誉为“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极大地增强了其合法性、成功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三) 彰显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基因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国外交战略策略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利益,试图通过冷战思维,如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小圈子政治以及选边站队等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并扰乱全球局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坚持独立自主的真正不结盟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不结盟、不冲突、不对抗的和平外交战略策略,彰显了中华民族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外交是真正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例如,面对美国的芯片封锁,中国通过举国体制加强芯片研发,实现自立自强;在俄乌冲突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选边站队,积极推动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积极斡旋沙伊和谈等。这些行动不仅反对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中国被国际社会誉为“和平缔造者”^⑤。

(四) 促进了国家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首要改革举措进行全面部署。^⑥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①③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

② 《王毅谈2021年中国外交: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外交的价值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112/t20211220_10471820.shtml)。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

⑤ 参见《外媒述评:中国“和平缔造者”角色实至名归》,参考消息网(<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7fab30d4fc244152943050ec8c0b9f66/1/2024-07-26%2011:42?childrenAlias=undefined>)。

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07月22日。

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策略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将一系列战略策略逐步转化为符合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国际合作组织、机制和国际对话协商合作平台，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提升国际制度供给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制度型开放水平。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等国际组织，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余年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1份自贸协定，并与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协议^①。通过将战略策略转化为国际长效合作机制，中国不仅促进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关系的稳定，也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武器。它不仅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对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策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正是在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包括时代方位、战略目标、全球伙伴关系、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道义感召力在内的战略策略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何以取得开创性成就提供了深具中国特色的解释性框架，也使中国特色大国战略策略展现了其伟大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 赵宁宁]

Understanding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Marxist Strategic and Tactical Thinking

Zhao Changfeng Zuo Xiangyu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t theory, Marxist strategic and tactical thinking encompasse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fundamental issues of strategy and tactic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formulating strategies and tactics. This ideology has not only provided significant guidance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practice but also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ategic and tactical system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rategic and tactical system for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oth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needs and reflects the diplomatic wisdom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gradually built a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tactics system that adapts to changes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op-down planning, a unique diplomatic strategic and tactical frame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framework integrat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strategic and tactical thinking and has developed a strategic and tactical system for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ered on the era's orientation, strategic goals, partnerships,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moral appeal. This system not only provides a distinctive Chinese interpretive tool for understanding the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s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fully demonstrat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i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tactics system.

Key words: The New Era,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m, Strategic and Tactical

^① 参见王文涛：《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推进经贸合作走深走实》，载于《求是》2023年第21期。